

外源与内生：绿色农业项目运行的地方实践比较

吴金芳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发展绿色农业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举措，而绿色农业进入乡村却遭遇诸多困境。通过对皖中乡村两次农业绿色项目发展实践的实地调查与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外源型绿色农业项目发展路径为政府外力自上而下推动，项目与乡村社会存在诸多断裂，内生型绿色农业项目则由乡村精英自下而上发起，且能够在内外互动中建立多重联系，让项目真正嵌入地方社会。内生型绿色农业项目能够整体性嵌入地方社会，主要得益于四个机制的协同作用：调动多元主体参与的组织整合机制、高效的技术扩散体系、稳定的市场连续体、传统生计文化的传承与活化。发展绿色农业应在尊重农民主体性的基础上，重视市场在内激励与政府的外在引导，发掘本土优势，探索多样化的绿色农业道路。

关键词：内生型绿色农业项目；外源型绿色农业项目；农业生态转型；嵌入

Exogene versus endogeny: Comparison of local practices of green agricultural project

Wu Jinfa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ology,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China 241002)

Abstract: Green agriculture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of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But when the green agriculture comes into the rural society, it encounters many difficulties. Through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wo practices of gree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rojects in village of central Anhui provinc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exogenous green agriculture project is promoted from top to bottom by external forces from government, and there are many breaks between the project and rural society. The endogenous green agriculture project is initiated from bottom to top by rural elites, and can establish multiple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公众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社会机制研究”（18BSH069）。
作者简介：吴金芳（1981-），安徽巢湖人，社会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环境社会学、农村社会学。
E_mail: jfwu1981@163.com. 依学术规范，相关人名、地名已做技术处理。

connections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teraction, so as to truly embed the project into local society. Endogenous green agricultural projects can be wholly integrated into local society, mainly due to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four mechanisms: The organizational integration mechanism to mobilize th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the efficient technology diffusion system, the stable market continuum, and the inheritance and activation of traditional livelihood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agricultur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inside encouragement from market and outside guidance from government. It also should to discover local advantages and explore diversified roads of green agricultural, that based on the foundation of respect the subjectivity of peasants.

Keywords: Endogenous green agricultural project; Exogenous green agriculture project; agro-ecological transition; Embedding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21世纪,随着石油农业弊端的充分暴露,推动农业生态转型的呼声日益强大。2017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质量兴农”,强调农业现代化要突出“绿”字,多措施、全方位推进农业绿色发展。2017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创新体制机制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就绿色农业发展做整体部署与推进。2018年、2019年和2020年的中央1号文件都对农业农村环境治理及绿色农业发展做出强调。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十四五”时期将是我国农业现代化从“绿色革命”向绿色、高质量发展实质性迈进的起步期^[1]。为促进农业生生态转型,加快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各地都在积极发展绿色农业项目,但一些地区却出现了的绿色农业项目“水土不服”的现象。众所周知,绿色农业在缓解农业环境压力、提高农业经济效益、改善食品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实现农业生态转型并非一蹴而就,也无固定模式供照搬套用。因此,急需厘清农业生态转型的社会机理,积极探索契合农村经济社会文化,反映农民需求的绿色农业发展之道。本文试图回答绿色农业项目发展的三个基本问题:绿色农业项目中各种主体的角色与职责如何?农业绿色项目成功运行的条件有哪些?如何处理绿色农业项目与地方既有农业传统之间的关系?

依据农业政治经济学对南亚、东南亚国家农业转型的研究,揭示了两种主流

的农业转型主导力量：商品化浪潮背后的市场力量，农业政策背后的国家及其权力结构^[2-3]。在市场主导的农业绿色转型实践中，农民常被理解为“理性经济人”，认为绿色商品的高收益是刺激农户发展绿色农业的内在动力，强调商品化、市场化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4]。但是绿色技术常常难以扎根乡村社会，特别是农业技术供给系统与分散农户对接的困境，降低了农户对绿色技术的信任与采用意愿。因此，降低绿色技术采用风险，有助于提升农户接纳和采用意愿^{[5] [6] [7]}。但实际上，农民也并非是完全的“理性经济人”，除了风险考量，农户对新技术的选择还受地方传统文化观念、生计结构、自然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需要从本地人视角看待新技术与农业发展^[8]。另外，从农业生产活动特性以及国家粮食生产安全的角度考虑，单纯依靠市场化力量来发展绿色农业还可能引发“市场失灵”与“粮食危机”^[9]。因此，依靠市场力量来主导农业绿色转型，并非最优选择。

国家主导农业生态转型隐含这样的预设：国家是农民的利益代理人。国家力量多采取项目的形式自上而下地推广绿色农业项目，国家力量或作用于技术进步和农业商品化，推动农业绿色变革，或通过宏观管理、产业政策、组织与技术创新体制等对绿色农业发展产生影响^[10]。但是国家力量主导的农业生态转型也存在两个悖论，首先，国家主导的农业生态转型具体落实依赖于地方基层政府，但是基层政府部门并非总是忠实的代理者。在自上而下的治理体系中，基层政府有自身的利益所求，地方政府往往是集“代理型政权经营者”与“谋利型政权经营者”于一身的“双重角色”^[11]。这种双重角色给地方农业发展带来很大不确定性，基层政府或迫于上级政府压力，运动式推广绿色农业，或从自身政绩、利益出发，有选择地、变相地发展绿色农业^[12]；其次，国家力量主导的绿色农业项目容易忽视农户自身的主体性，导致农户参与不足，农户与农村社会的真实需求难以有效表达，违背农业生产规律^[13]。由于以上悖论的存在，国家力量主导的农业绿色项目常常“虎头蛇尾”，“好心办坏事”。

实际上，农业生态转型是一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农民等多元社会行动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过程，各主体在农业生态转型中承担的功能不一，不能相互取代^[14]。要克服政府在农业生态转型中的越位、错位，尊重市场规律，更要重视农民的主体地位。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指出要想转变传统农业，必须重视与尊重农业生产的主体。同理，农业生态转型与农民发展是两个紧密相关的命题，发展绿色农业离不开发挥农民及农村社区的主体性作用^[15]。

农业转型的基本要义是农业发展模式的“范式转换”。农业生态转型则预示

着建构一种更理性的现代农业范式，以绿色、生态为核心理念，追求农业生产中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的和谐^[16]。作为一种新的农业发展范式，绿色农业与传统农业、石油农业既有本质区别，但也有无法隔断的内在联系。农业生态转型不是彻底抛弃传统农业，也不是简单回归传统农业，而是对传统农业中蕴含的生态智慧进行再认识与创新，寻找绿色农业技术与传统生态智慧的耦合^[17]。农业生态转型也不是完全抛弃石油农业，石油农业引发的环境污染，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是绿色农业发展的重要诱导力量和市场契机^[18]。

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明确了政府、市场在发展绿色农业项目中的引导作用，但不可忽视农民的主体地位，农村、农民是理解农业生态转型的重要视角。农户的主体地位如何保证，如何协调好政府、市场、农户三种力量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索。在农业生态转型内容方面，已有研究分析了新技术、商品化、农户风险意识等要素对发展绿色农业的影响，但对农业绿色项目产生、发展的微观社会运作机理的揭示仍不够充分。已有研究表明农业发展具有历史性与系统性，绿色农业项目不是对已有农业传统的简单否定，应在尊重地方农业传统与乡村社会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与发展。但如何处理好新的绿色农业项目与农户既有生计传统的衔接、转换与创新，需结合实地案例挖掘多样化的符合农村经济社会、自然特点的绿色农业项目运作之道。

本文的实证材料来自笔者2015至2019年间共计30余天在皖中农村就农业绿色项目展开的田野调查。调研方法方面主要采用参与观察与半结构式访谈收集资料，主要观察村庄自然、经济环境、村庄社会结构、绿色农业项目实际运行情况等，选取乡镇干部、乡镇技术员、村委干部、村民小组长、乡村精英、普通村民等群体进行深度访谈。田野调查兼顾宏观情势把握与微观实践运行。宏观上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对村庄经济社会发展、村庄社会生活、绿色农业项目发展模式等方面情况进行总体把握，微观方面重点关注了W村的两次绿色农业转型实践。下文将聚焦W村的绿色农业项目，从农民视角考察绿色农业项目如何进入乡村，如何被农户认识、选择、接纳与发展。

W村位于皖中，种养结合是当地农户生计结构的主要特点。2018年底，W村共有土地面积71平方公里，207户，789人。由于村庄地处皖中丘陵地带，梯田和低山是主要地貌特点，历史上W村所在地区主要种植水稻、红薯，兼饲养鸡、猪、牛等家畜。2010年，为推进当地农业生态转型，政府在W村推广种植双孢蘑菇，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项目推广失败。2014年W村开始了第二次农业生态

转型尝试，这次转型由返乡农民发起，以家庭小规模种养结合为特色，发展绿色农业项目，经过6年多的发展，已初具规模，发展势头良好。

二、政府推动的外源型绿色农业项目及其失败

近年来，在中央政府生态文明执政理念的影响下，地方政府发展绿色农业的积极性很高。2009年C市启动了“绿色农业”品牌建设项目，同时结合新型农民培训、科技入户等项目，扶持与推动农业生态转型。2010年W村被地方政府选为双孢蘑菇种植示范村之一，政府计划在W村先行试点，树立绿色农业项目发展典型，积累经验，再向周边农村推广。为保障W村双孢蘑菇种植项目的成功，地方政府从技术供给、资金支持、组织管理等方面开展工作。

首先，做好绿色农业技术知识宣传与培训。考虑村民对绿色农业及双孢菇种植知识的认知与了解十分有限，市、镇农技部门牵头组织开展了三轮宣传推广工作。第一步，集中发放宣传手册，通过宣传手册帮助村民知晓双孢蘑菇种植的基本知识、市场价值、生态环境影响等；第二步，为村民免费提供绿色技术培训，政府从安徽农业大学请来专家，为村民免费提供绿色技术培训；第三步，镇农技部门承诺提供全程技术指导，安排地方政府农技人员与种植示范户结对帮扶，为种植户提供全程技术支持。

再次，资金支持方面，利用财政补贴、免息贷款吸引农户积极参与。村民双孢蘑菇种植的投入主要有三块：菇棚，辅料、菌种等，以一亩双孢蘑菇计算，种植成本约3.4-4.6万元。其中菇棚是大头，成本约2.5-3万元，地面菌床0.7-1.2万元，菌种0.2-0.4万元。政府对种植户的财政支持可分为两部分：直接财政补贴和免息贷款支持，每亩大棚政府直接补贴2000元，农户还可申请享受1-10万元的免息贷款。

最后，组建“自上而下”的组织管理与绩效考核机制，通过行政管理与绩效考核机制保障项目实施效率。实行“市-镇-村”的推进模式，市、镇两级分别成立“绿色农业品牌项目建设小组”，组长都是分管农业的一把手担任，村一级工作由行政村书记负责。同时对项目工作实施年度绩效考核，对每一级政府（组织）工作目标完成情况展开评价。政府试图通过构建“自上而下”的组织管理网络，保障农业绿色项目高效、有力实施。

政府通过各项措施将W村的双孢菇种植项目“扶上马”，但是项目的实际运行却困难重重。首先，技术嵌入困境是导致项目失败的关键因素，政府书面化和运动化的技术宣传与培训难以被村民接收和消化，绿色技术难以扎根乡村社会。政

府通过讲座、宣传册等形式向农民输入知识，但是村民难以掌握“PH值”，“菌群”等技术话语，特别是把专家讲授的“书面知识”转换为具体操作方法时，村民普遍遇到困难，“专家讲的都是理论，用的时候心理没谱”。其次，政府技术供给与农户技术需求二者之间的时空错位。政府的技术支持主要集中在项目宣传期，农户技术需求则贯穿于项目实施过程。早期政府农技人员多次进村宣传，如发放小册子、开展专家讲座等，但村民没有实际种植经验，对技术知识不敏感。进入项目实施阶段，农户有了真实的技术需求，但获得技术支持反而减少。尽管政府规定市镇农技人员与农户结对子，但是实际上住在市镇的农技专家很少有时间进村，加上市、镇农技人员数量较少，无法为分散的农户提供长期有效的技术支持。农户技术掌握不到位，病虫害控制不好，导致双孢菇产量低，品质差，种植收益不理想。

其次，市场销售不畅加速项目失败。从销售定位来看，政府将W村双孢菇的销售定位于城市居民高端消费，政府的销售策略以拓展外地大城市市场为目标，重视与外地大企业对接销售，这导致农户在销售市场中缺乏话语权，价格制定、品质把控都受制于外地经销商，农户十分被动。在外地市场销售遇阻的情况下，政府尝试开拓本地市场，但是本地居民没有食用双孢菇的习惯，居民称双孢菇为“洋菇”，并认为“洋菇”味不美，且价格贵，以致本地市场销量仅占一成。外地市场不易打开，本地市场又无法对项目形成基础性支撑，销售困境严重挫伤农户种植信心，加速项目失败。

2010年，W村有23户农户参与种植项目，共种植27.3亩，23户农户中，4户盈利良好，每亩收入1万元，10户微有盈利，9户亏损。过半种植户失去信心，原本持观望态度的农户则变得更为谨慎。2011年，尽管政府一再鼓励农户坚持种植，但是实际仅有8户种植了6.5亩。2010至2011年间，双孢菇销售困难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农户的种植意愿不断降低，2012年，仅5户种植4.3亩，其中3户都是村干部，迫于头带示范的压力坚持种植。2013年以后，村里就没人种植双孢菇了。W村双孢菇种植项目艰难运行了3年，以失败告终。

三、乡村精英引领的内生型绿色农业项目及其成功

经历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农业正在经历一场由食品消费趋势变化而引致农业结构调整的“隐性农业革命”^[10]。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攀升，中国人的食物消费需求已从注重量的满足，转变为重视食物品质、食物安全及食物消费的美好体验。食物消费趋势的变化也调动农村精英群体追求农业转型与变革的

积极性。

政府发起的绿色农业项目虽然失败了，但它将绿色农业的理念带入乡村，激发乡村精英群体转变农业发展道路的探索。2014年，乡村精英Y发起了W村农业生态转型的第二次尝试。村民Y曾是兽医，早年在江苏的养猪场养过猪，并且还当过村干部，这些经历使得村民Y“懂技术，有眼光”。2013年，因孩子教育问题村民Y从城市返乡定居，Y想在家乡创业，但苦于没有好的项目。回乡生活一段时间后，Y发现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正在发生分化，一部分收入较高的农户已不满足于从市场上购买的普通养殖家禽，这类肉口感差，安全性也无法保证。他感觉可以试试生态种养项目，种红薯，养殖黑毛猪和山鸡。结果产品供不应求，第一年就盈利3万多。2014年Y正式开启了他的生态种养创业之路，Y承包了村里20亩田山地种植红薯，收获的红薯加工成粉丝出售，薯渣饲养黑猪与山鸡，猪粪则作为有机肥料回地，种养结合，形成了良好的农业能量循环。Y生产的粉丝、猪肉与鸡肉品质好，口感佳，生态安全，不少人慕名上门来购买，特别是春节前后，返乡的农民争相购置，市场销路很好。2014年底Y净获利约6万元。2015年，Y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规模，净获利9万元。

Y创业成功的例子很快成为周边乡村学习榜样力量，由于养猪、养鸡和种红薯是当地的传统生计方式，对普通农户而言技术难度不大，一些精明的农户也在村里搞起了小规模家庭绿色种养。2016年，W村有已6户加入家庭绿色种养行列，其中有3户是外地返乡农民，他们正是看到Y的绿色农业项目收益稳定、丰厚，才敢于返乡创业。2017年，共有11户参与。

随着新农户的不断加入，慢慢形成规模效应，但也引发新问题。农户间相互压价，恶性竞争。一些农户为了抢客户，降价销售，购买商则趁机压价。价格恶性竞争导致农户获利空间不断压缩，农户生产积极性降低，一些无力应对“价格战”的农户从养殖场购买饲料喂养的猪和鸡，改用薯渣、稻糠饲养一个月，再打着“生态”的幌子销售。甚至有少数农户直接从养猪场购进黑猪，冒充自家饲养的生态黑猪对外出售。价格战导致产品品质下降，消费者不认可，W村的绿色农业项目发展遇阻。

地方政府及时介入，助推绿色农业项目良性发展。2017年12月，镇政府推动成立绿色种养合作社，扶持W村绿色农业发展。选任Y任为社长，重点抓生产，分管农业的副镇长李先生和村支部书记刘先生担任副社长，负责产品销售。社长Y负责给农户提供技术指导，管理生产过程。合作社帮助分散农户实现养殖过程中

技术操作的规范化与标准化。由镇畜牧站站长和Y领头，联合懂技术、有经验的农村精英，制了定农户技术指导手册，分发给农户。合作社免费为农户提供相关技术指导，规范农户生产行为，合作社与农户签订生产过程管理协议，确保农户家庭养殖必须按照合作社技术规定进行，严控农产品品质。村民Y集社长、养殖户、技术员、监督员等多种身份于一身，对上承接政府技术支持，对下与普通农户实现技术对接，并且Y居住在村里，亲自示范种养，可以随时为村民提供技术示范与讲解，还能督促农户自觉遵守合作社技术规范。在销售方面，副镇长和村支书抓销售工作后，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首先，确立了统一的销售体系。普通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参与合作社，与合作社签订合同，农户按照合作社的要求开展种养，最终的商品由合作社统一定价并销售。其次，突出“绿色牌”，提升合作社品牌价值，重视重点人群的推广。在镇政府的支持下，注册申请“惠农”商标，利用乡村熟人社会网络拓展本地消费市场，对春节前后返乡的农户、回乡治疗休养人群等重点销售消费对象展开销售。同时合作社也在积极拓展互联网销售，特别2020年初新冠疫情期间，合作社通过微信、抖音等APP 积极开展线上销售接单，线下无接触配送，借助互联网、熟人圈等实现农产品的短链供应，实现消费者与生产者直接对接，有效地避免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信任危机。

政府及时介入加强了对农户的组织与管理，理顺了生产和销售的关系，W村绿色生态农业项目迈入健康发展道路。2018年以来，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思想的指导下，项目在资金和技术方面获得政府的积极支持，2019年W村的绿色农业项目被地方政府列为“绿色农业品牌”重点建设项目。环保公益组织也与合作社建立其合作关系，开展活动，如以W村为基地，组织亲子绿色种养营等活动，宣传与推介W村的农业绿色转型经验，组织相关农技专家进村等。项目步入健康发展轨道后，又有新农户不断加入进来，截止2019年12月，已有23户农户自愿参与合作社，养殖品种也从原来的黑猪、山鸡拓展到羊、鸭、鹅等。

四、两种绿色农业项目运行的关键因素对比

W村的两次农业绿色项目结果迥异。下文将结合W村的两次绿色农业项目发展实践，从组织、技术、市场、生计文化等方面展开对比分析，梳理绿色农业项目进入乡村并成功运行的社会条件，为引导与帮助小农发展绿色农业项目提供教训与经验。

1. 组织整合机制

尊重农户的主体地位，形成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组织整合机制是绿色农业项目

成功转型的关键。在政府发动的外源型绿色农业项目中，政府运动式推广与普通农户参与之间存在明显断裂。政府是W村农业绿色转型项目的发起者和主要推动者，项目初期借助“市-镇-村”三级准科层化的组织体系，短期内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将项目扶上马。一旦完成项目推广目标，来自上级压力消退，政府工作人员的行动就失去动力支撑。村民反映“一开始搞双孢菇种植时，干部跑断腿，后来，真干了，反而没人来（村民魏先生访谈，2016-4-23）。”不可否认科层制理具有精确性、效率高、持续性、统一性等优点，但科层化的治理手段也兼具诸多内生缺陷：实施手段的刚性与不灵活、排斥公众参与等^[20]。政府运动式推广拒斥农户参与，以致农户的知情权、表达权与参与权无法保证，农户没有被真正组织动员起来。政府主导的运动式推广模式运行成本高，没有农户的自觉参与，导致项目后续发展乏力，无法持续。

精英发起的内生型绿色农业项目中形成了“农户参与-精英示范-政府帮扶”的组织整合机制，普通农户、乡村精英与政府力量之间实现融合。首先，农村社会强烈的发展需求，构成了W村农业生态转型的内生动力。内生型绿色农业项目发展过程中，普通农户自觉参与，从项目选择，到技术掌控等方面，农民的主体地位得到保证，为项目成功奠定了良好的乡村社会基础。地方政府及时介入，主动引导和服务，化解了乡村农业绿色项目面临的农户合作、市场对接等关键难题，对W村农业发展起到了良好外力助推作用。乡村精英位于组织链条的中间，起到了“上传下达”的作用，促成了村民、政府两种不同力量的糅合。在项目发展过程中，生态精英威望高、群众基础好，并且亲身实践与示范，调动了农户参与的积极性。与普通村民相比，乡村精英对国家的农业政策、农业信息资源等更为关注和敏感，乡村精英也更容易获得地方政府的关注与支持，是政府乡村工作的重点对象。换言之，乡村精英更易与地方政府部门建立持续性互动关系，这就使得乡村精英在正规与非正规资源方面，都更易获得支持，使得政府资源能够更快、更多、更准地进入村落。通过精英的链接机制，W村农业绿色转型项目实现在组织层面形成软性嵌入，形成了农户致富、精英创业、政府引导的合力。

2. 绿色技术嵌入链条

良好有效的农技扩散体系是发展绿色农业的基础。新技术要扎根乡村，要经得住两个环节的考验，一是进得去，即解决技术“入场”问题；二是要落脚、扎根，即技术融入乡村经济社会结构中。在W村外源型绿色农业项目发展实践中，新农业技术供给仅实现“入场”，后遭遇政府农业技术推广中最常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即政府农技推广体系与分散的小农社会之间存在断层^[21]。这种断层

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技术供给主体与受体的话语断层。W村民没有双孢菇种植经验，村民缺乏双孢菇种植技术的亲身体验与感知，完全依赖政府技术体系供给。但是，受话语体系的影响和已有知识结构的限制，普通村民常常难以接受与消化政府引入的技术专家知识，技术专家的话语体验具有科学化、标准化、专业化的特点，而普通农户更倾向于接受日常化、形象化、本土化的技术话语体系；二是技术供给主体与受体之间的时空错位。政府技术供给主要在项目推广初期，而农户的真实技术需求则集中于项目实践环节；且政府技术推广体系中的专家多高高在上，住在城镇，既无法为乡村村民提供鲜活的技术示范，又不能随时满足村民的技术需求。政府技术供给体系与小农乡村社会无法有效对接，绿色技术脱嵌于乡村社会，成为外源型农业绿色项目夭折的重要原因。

内生型绿色农业项目中形成了政府农技专家-精英“土专家”-普通农户的技术扩散链条。从经济学的角度思考，农民是理性的，新生态技术投入越少，失败风险越低，就越容易进入农村^[22]。内生型绿色农业项目能较好地结合农户已有的技术经验积累、技术认同，大大降低了农户对新技术的风险担忧，农户风险控制体验良好，更倾向于接受新技术，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新技术“入场”障碍。而乡村精英作为技术嵌入链条的中间环节，实现了政府集中技术供给体系与分散小农的对接。乡村精英向上承接了政府农技系统的知识输入，乡村精英学习与接受新技术意识强烈，会积极面向上寻求政府、高校专家的技术支持，借助乡村精英的这个联结点，政府农技支持可以最快进入乡村。向下看，精英“土专家”扎根乡村，且是熟人社会中的一员，农户与精英“土专家”的熟识程度有助于提升农户对绿色农业技术的信任，而且农户遇到困难，可随时寻求精英帮助，农户获取技术的路径简单、易行。凭借精英“土专家”的在地状态，政府才能真正实现绿色农业技术在乡村社会扩散、转化。

3. 市场激励与考验

绿色农业项目成功运行最终还要经受住市场考验。政府发起的外源型绿色农业项目以外地大城市销售为方向，无形中放大了小农户在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在外地市场销售遇阻的情况下，政府被迫尝试开拓本地市场，但是本地市场对项目产品接受程度很低，项目产品最终无法获得市场认可。终端没有良好的市场销售，前端生产难以持续。外源型的绿色农业项目忽视市场销售体系与地方社会的连续性，导致项目市场销售与农村社会脱节。

内生型绿色农业项目形成了以本地熟人市场为依托，外地市场、网络销售为方向的市场连续体。在销售对象定位上，迎合本地市场消费升级的新需求，产品

定位于注重追求食品的健康与美味的新农民群体。项目初期本地市场是销售主体，近70%产品在本地熟人市场能消化掉，为项目成长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借助农村熟人社会网络，拓展市场销售，项目市场销售圈与乡村熟人关系圈是重叠的，随着熟人关系圈的扩大，市场销售范围自然拓展。进城务工、创业的农民群体不断把W村的绿色农产品推介到城市，以农村熟人网络为基础的销售网络，也随之延伸到城市。内生型绿色农业项目中，本地市场的托底使得小农应对市场风险能力增加，也为小农在市场拓展中争取到更为主动的地位，不会被动受制于市场。

4. 生计文化传承

农业生产是经济行为，更是社会文化现象。一个地区生计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是地方经济社会、自然系统中诸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内在合理性与稳定性，并且特定生计模式还会衍生相应的农业生计文化传统，以维持该生计模式的延续与发展^[23]。W村是典型的丘陵山区，历史上农户主要种植水稻和红薯，饲养鸡、猪、牛，种养结合。外源型绿色农业项目中，政府强行干预农户种植双孢菇，绿色农业项目与地方已有生计传统脱节，与地方传统农业生计文化之间存在断裂，农业绿色项目脱嵌于地方原有生计文化。政府看好的“致富菇”，到村民眼里就变成“洋菇”或“外来菇”，农户对种植双孢菇认同度低是项目转型失败的深层社会文化原因。

“政府的愿望是好的，但是那个洋菇我们这里的老百姓都不喜欢。我们这里原来主要种水稻、红薯什么的，大家都习惯了，突然种这个，不少人搞不好。还有就是种出来的“洋菇”我们自己不吃，又不好卖，那东西是鲜货，又不能存放，卖不掉就看着它烂掉了，喂牲口都不行，哪有种粮食实在？”（W村村主任王先生访谈，2017-8-5）

内生型绿色农业发展项目重视地方传统生计文化的传承与活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农民对新技术的选择受本地传统生计结构及其背后的自然环境制约，这种制约主要通过生计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W村地处皖中丘陵地带，种粮、饲养家畜是当地农业生计安排中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在家庭内部实现种植业与养殖业的结合，实现物质资源充分利。正如一位老农所说“栏中无猪，田中无谷。”种养结合的生计结构安排是传统时期的小农遵循自然农业法则，降低生计成本与风险的最优选择，对农户生计世代延续十分关键，人们积累了大量种养结合的地方性知识，这一传统深深植根于当地农户的文化认知中。种养结合的生计文化认知系统必然影响与制约农户对新技术的选择。内生型农业绿色项目正是遵循了当

地传统生计安排，在文化认知层面，项目顺利嵌入本地生计文化系统，实现了传统农业生计文化的活化与传承。

五、结论

绿色农业是中国农业现代化及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探究绿色农业项目进入并扎根于农村社会的社会机制尤为重要。通过对比研究发现，外源型绿色农业项目能够迅速进入乡村，但项目难以扎根乡村社会。在政绩驱动下，地方政府可以凭借其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自上而下地将绿色农业项目快速植入农村，但却存在农业绿色项目与农民、农村社会、地方农业市场体系及传统生计文化之间的四重断裂，项目脱嵌于地方社会，是其失败的总体性原因。相较于外源型农业绿色项目，内生型绿色农业项目发生于地方社会内部，乡村精英是项目发起与发展的重要组织者，农民是主要参与者，政府则是外在的扶持者与监管者。内生型绿色农业项目更符合农村经济社会实际，能够给农户、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切实利益，更易获得地方社会认同。具体而言，内生型绿色农业项目的成功，主要源于四个关键机制的支撑：组建“农户参与-精英示范-政府扶持”的组织整合机制；形成“政府-精英-农户”的绿色技术扩散机制；依托熟人社会构建稳定的市场销售机制；实现传统生计文化的传承与活化机制。正是这四个机制的协同作用使得内生型绿色农业项目能够整体性嵌入地方社会，帮助项目在乡村经济社会系统中扎根、成长。

首先，参与主体的多元性是农业模式转型的重要特质，构建合理、稳定、协调的多主体关系是农业项目成功运行的关键^[24]。内生型绿色农业项目成功的关键在于尊重农民及农村社会的主体性，以农村精英为核心，形成乡村社会多元力量的整合。农户是主体参与力量，普通农户的经验认知及自觉参与是项目发展过程中的积极推动因素。重视发挥农村精英的多重角色身份，农村精英是项目的发起者、示范者、组织者。政府是外在的推动者、扶持者，政府介入应建立在尊重农民主体性的基础上，借助政府的外力，为项目发展构建合理的制度环境，保证项目的健康发展。

其次，生态技术扎根乡村是绿色农业项目顺利运行的基础条件。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视角看，生态技术进入乡村还要考虑新技术与农村社会结构、乡村社会文化的适应^[25]。发展绿色农业应重视寻找绿色技术与地方传统技术之间的链接与耦合点，降低绿色技术进入门槛。生态技术与传统技术的耦合有助于农户将先

前经验的移植，降低农户采用新技术的风险担忧。乡村精英则是完成绿色技术本土化转化的重要人群，通过精英群体的亲身种养实践，传统技术的发展、创新与新技术的本土化同时进行，以精英为中心的乡土熟人关系网络是绿色技术在乡村扩散的基本路径。

再次，成熟稳定的市场销售体系是项目持续发展的重要激励机制。农民的市场交易行为受熟人社会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影响与制约，内生型的绿色农业项目重视本地熟人市场的开发与深耕，借助乡村社会特质，形成稳定销售网络，将项目市场销售嵌入地方社会。另外，建立在熟人关系网络基础上的市场销售模式具有很高的韧性和延展性，重视市场销售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良好的本地市场销售对项目发展形成托底作用，为后期项目参与外地市场销售与网络销售竞争提供了良好的支撑。

最后，传统生计文化的传承与活化是绿色农业项目成功运行的深层乡土文化基础。当地方传统生计方式因外力干预而必须发生转变时，地方族群在重构新的生计方式时会积极尝试寻找新生计方式与原有文化心理上的整合与适应^[26]。发展绿色农业不能简单隔离传统地方生计文化影响，应重视传统地方生计文化的惯性，要正视地方农业发展的经济社会、自然基础，尊重已有的农业文化观念、地方生计结构、自然环境等诸多因素对农业绿色项目的影响。对传统生计文化中的智慧再认识与再发展，可以为绿色农业项目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基础。

发展绿色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对中西部农村地区而言，发展绿色农业要从农民视角出发，从农村经济社会的真实情况出发，关照农村经济社会的多样性，探索与挖掘“接地气”绿色农业项目。在尊重农村主体性地位的同时，还应重视市场内在激励和政府外在引导，构建良好的经济、制度环境，循序渐进地引导地方农业生态转型。

参考文献：

- [1] 金书秦,牛坤玉,韩冬梅., 2020(2):30-39. 农业绿色发展路径及其“十四五”取向[J]. 改革.
- [2]HART G. Agrarian Transformation: Local Process and the State in Southeast Asi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 [3]PINCUS J. Approaches 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arian Change in Java[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1990(1):3-40.

- [4] 李明月, 陈凯.,2020(4):10-19.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与行为的实证分析[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5]潘睿.2010(6):10-13.生态技术社会选择的困境及克服[J].贵州社会科学.
- [6]HANSSON L. Measuring farmers preferences for risk:A domain—specific risk preference scale [J].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2012 (7) : 737-753.
- [7]张云华,杨晓艳,孔祥智,方松海.2004(11):216-218. 发展绿色农业技术面临的难题与出路[J]. 生态经济.
- [8]强舸.2013 (2): 177-202.发展嵌入传统:藏族农民的生计传统与西藏的农业技术变迁,开放时代.
- [9]张孝德.2011(5):47-51.农业工业化失灵与中国特色农业发展模式思考[J].国家行政学院报.
- [10]赵大伟.2012 (11):72-78.中国绿色农业发展的动力机制及制度变迁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
- [11]荀丽丽,包智明.2007(5):114-128.政府动员型环境政策及其地方实践——关于内蒙古 S 旗生态移民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
- [12]邱福林.2010(3):84-86.政府在发展农村产业中的角色与职能——对江西 Y 村个案的反思 [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13]魏琦,金书秦.2018(3):49-50.推进农业绿色发展需要关注四个问题[J].农村工作通讯.
- [14]于法稳. 2016(4): 42-44.实现我国农业绿色转型发展的思考 [J]. 生态经济.
- [15]石磊.2012(2):43-46.生态农业与农民发展[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16]张庆伟.,2017(2):99-107.“否定之否定”——生态农业的中国式进路之思[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17]罗亚娟.2016(06):188-193.传统池塘养鱼的方法、环境效应及其当代启示——太湖流域菱湖案例研究[J].农业考古.
- [18]陈阿江. 2017-12-15(006).共生农业:生态智慧的传承与创新[N]. 中国社会科学报.
- [19]黄宗智.2010:127-132.中国的农业隐性革命,法律出版社.北京.
- [20]郁建兴,刘大志.2003(2):6-14.治理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21]陈辉,赵晓峰,张正新.2016(1):77-88.农业技术推广的“嵌入性”发展模式,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2]蒋剑勇,钱文荣,郭红东.2014(2):17-25.社会网络、先前经验与农民创业决策[J].农业技术经济.
- [23]庄孔韶.2006(7):35-41.可以找到第三种生活方式吗?——关于中国四种生计类型的自然保

护与文化生存[J].社会科学.

[24]张旭.2017(6):88-92.我国农业项目网络治理结构研究[J].河南社会科学.

[25]陈涛.2010(6):87-93.生态技术推广的体制性缺陷与破解路径——皖南大圩生态养殖技术推广的实践与启示,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6]罗康隆.2006(6):86-93.乡民社会中的风险最小化与利益最大化——侗族社会传统生计方式与生存保障的文化解析[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